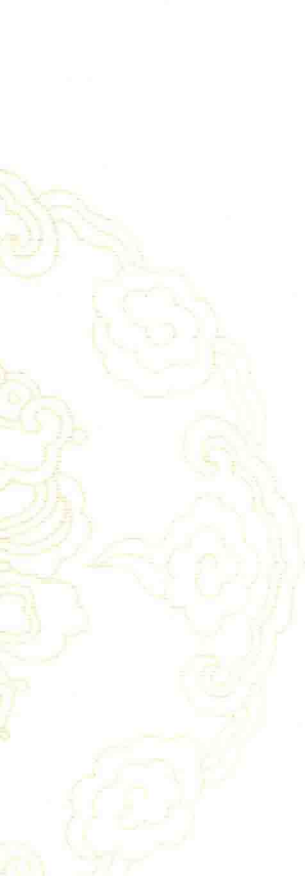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变迁与重构(1919-2018)

李 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
外
借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变迁与重构(1919-2018)

李 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变迁与重构: 1919-2018 / 李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203-4500-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1919-2018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11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目 录

绪论	(1)
一 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同观点及其范式	(1)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兴起十年的“民族文化热”	(4)
三 21 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文化嬗变与民族自信研究热潮	(9)
四 关于前人研究成果的评论与思考	(12)
五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及方法	(15)
第一章 “盛世王朝”背景下国民的东西观及文化心态	(18)
第一节 民族文化自信的内涵及意义	(19)
一 文化的内涵分析	(19)
二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中国化成果	(24)
三 关于文化自信概念的界定	(27)
第二节 中西文明碰撞下的中国社会	(32)
一 中西方文明的双峰并峙和震撼	(33)
二 落日辉煌：“康乾盛世”的闭关保守	(41)
第三节 国势之兴衰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48)
一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原因的检讨	(49)
二 鸦片战争后士人“中国观”的转型	(52)
结 语	(55)
第二章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嬗变下的文化心态变迁	(56)
第一节 著名政治家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研究	(57)
一 太平天国领袖视野中的文化传统与心理转换	(57)
二 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 中西文化观	(63)

三 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毛泽东 和周恩来	(73)
第二节 著名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研究	(81)
一 文化保守主义：从马一浮到辜鸿铭	(82)
二 文化激进主义：从陈独秀到李大钊	(89)
三 文化理想主义者的歌唱：瞿秋白和鲁迅	(94)
第三节 近代教科书的演进与民族文化自信之变迁	(102)
一 浸润与激荡：清末民国新教育中教科书的变革	(103)
二 “建造常识”：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近代转型特征	(110)
三 “迎新纳旧中的坚守”：清末民国教科书的文化特征	(118)
结 语	(120)
第三章 近代民族文化自信建构历程及其反思	(122)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危机的本能应对	(122)
一 清末“体用之争”：承上启下的第一次文化大辩论	(123)
二 民初“中西之争”：开新弃旧的第二次文化大辩论	(128)
三 “本位之争”：溯本探源的第三次文化大辩论	(136)
第二节 1949年以后台湾知识界的文化反省与批判	(143)
一 1958年台湾四教授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 人士宣言》	(144)
二 20世纪60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的再认识	(147)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文化道路的选择与整合	(150)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传统文化的大论战	(152)
二 2004年北京七十方家的《甲申文化宣言》	(155)
三 近代文化宣言对中国发展路向的启迪	(159)
结 语	(163)
第四章 全球视阈下世界各国文化自信构建之镜鉴	(166)
第一节 超级帝国：美利坚的强权霸道及文化自信	(168)
一 “二战”后全球控制与美国的文化自信	(169)
二 “二战”后美国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	(172)
三 美国文化的体制优势与资源基础	(178)
第二节 经典欧洲：苏德两国的民族文化自信	(182)

一 战斗民族俄罗斯的文化自信和困境	(183)
二 德国日耳曼文化之民族主义思想探源	(195)
第三节 亚太地区民族文化自信之比较	(204)
一 印度崛起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205)
二 从自卑到自信：澳大利亚的文化历程	(213)
结 语	(221)
第五章 儒学背景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选择	(223)
第一节 脱亚入欧：近代日本社会的文化转型	(224)
一 日本文化自信：生成与借鉴	(225)
二 “二战”后日本文化发展战略	(230)
三 日本物质性文化产生的自信力	(233)
第二节 儒家文化圈与亚洲“四小龙”社会变迁	(238)
一 韩国之儒学转型与东北亚发展模式	(239)
二 新加坡的精英主义文化	(245)
第三节 坚守中的转型：港台地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255)
一 传承与交融：台湾文化之镜像	(255)
二 香港文化的尴尬围城	(264)
结 语	(272)
第六章 大国复兴进程中的民族文化自信建构	(274)
第一节 大国复兴曙光及文化软实力的缺失	(275)
一 用全球视野谋大国复兴	(277)
二 软实力：补齐大国复兴的“短板”	(281)
第二节 未来国家文化战略的五个核心问题	(292)
一 文化立魂：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	(293)
二 返本开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	(297)
三 内外兼修：维护文化安全，加强对外交流	(302)
四 双轮驱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308)
五 重点突破：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310)
第三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点难点	(314)
一 教育：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315)
二 党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发动机	(321)

三 精英：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孵化器	(325)
结 语	(329)
余论：民族复兴背景下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塑造	(332)
一 自信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333)
二 自信于我们的理论是科学的	(335)
三 自信于我们的文化是先进的	(338)
四 自信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341)
大事记	(348)
参考文献	(356)
后记	(371)

绪 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最近十年以来的两次高潮。整体的看，第一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解决了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战略性的，目前依然方兴未艾，且必将促进当前和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在目前的第二次研究高潮中，研究者们只有提高全球化的理论视野，突破文化、产业学科界限，从社会学走向政治、经济学视野，我国的文化研究才能真正产生长久而深远的社会效果。如何客观辩证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研究的两次热潮，对于揭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激荡下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嬗变轨迹，吸收欧美大国崛起及港、台地区经济腾飞过程中文化自信重建的经验教训；对于应对全球化战略背景下民族复兴历程中文化建设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华文化复兴重建的理论模式和政策路径都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 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同观点及其范式

海外视野中较早关注中国文化与民族性问题是西方传教士群体。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中国人的素质》（〔美〕明恩溥，1894）开创了西方研究中国国民性问题的先河。《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英〕阿绮波德·立德）、《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 A. 罗斯）等“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时事出版社，1998）则全方位展现了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文化曾持绝望态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 1922 年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出：在民族国家中，社会的生命力主要来自文化。在他看来，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不朽，民族就

有希望。

18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越来越闭锁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涌现出了丰富成果。此间，欧美学界出版了大量以中国文化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和论文，并相继在美国、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建立了一些中国研究中心，掀起了所谓的“海外中国热”。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教授的《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史》《观察中国》等著作，包括其“挑战—回应”的研究模式皆令人瞩目。20世纪60年代，海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当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列文森教授。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撞击，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最突出的文化遗产，越来越没落……儒学所赖以生长的土壤已经丧失。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说服力、生命力正在逐渐减退……总之，其已经在20世纪初逐渐被埋葬，目前已更无生命力可言（美国《知识分子》1986年秋季号，杜维明文）。"^①当时，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部影响甚大的著作中也曾明确提出：“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学基础，所以无法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因而儒家特点在于适应而不是改造世界。”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明不适应于工业文明，是属于与农业文明相一致的前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明处于某种对立紧张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改变中国传统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化社会。可以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长时间严重束缚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趋向。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儒家文化区”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韦伯论断开始受到严重挑战。许多西方研究者，甚至日、韩学者都针锋相对地做出了新判断，要求重新估价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1973年，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一反“西欧中心论”，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有助未来世界政治和精神上统一”的主张；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于1979年在其著作《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也提到了儒家伦理对这一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所产生特有的贡献。稍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默斯·约翰逊教授也谈及“后（新）儒学时代”到来的问题。此间，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加藤周一、中村元及韩国学者金日坤也都

^① 刘奉光：《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社会科学》1987年3期，第47页。

认为：根深蒂固的儒家学说仍是当今东亚地区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源泉，我们应该建立具有东方文明特质的“汉字文化圈”，以此来抵御由西方国家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加藤周一还特别强调了儒家代表作《论语》对日本民族精神形成的巨大影响和当代重视儒家伦理的必要性：“长期以来，《论语》已经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即使不能全面吸收，对其中的积极部分，我们还是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①1986年1月，首届国际中国文化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上海市负责人江泽民出席盛会。俄罗斯齐赫文斯基院士、日本学者大庭修、联邦德国学者庞纬、傅敏怡、加拿大学者秦家郎、美国学者阿伦·沃克曼等人与会，并讨论了中国文化传统再评价及中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议题。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推崇伦理和实践的人文精神，应该为现代西方人所效法和学习。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一书提出：后冷战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将是现代化后期阶段推动非西方化复兴的重要因素，其将对美国全球安全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那一时期，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海外“儒学没落”“文化威胁论”曾长时间影响了国内文化研究的范式趋向，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与西方研究者不同，基于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情怀，此间大量海外华裔学者如周策纵、余英时、黄仁宇、林毓生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命运做了深入研究，并以杜维明为代表提出了“儒学复兴”说。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杜维明在梳理儒家文化发展历程后提出：儒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应是先秦至两汉，也是初兴和繁荣时期；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在应对当时的佛、道论争背景下逐渐成熟起来的；明清之后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此间开始对传统儒学结构进行挑战和革新。而在近现代以来，儒学广泛受到批判与质疑，表面上似乎呈现出了一种日薄西山的落魄姿态。那么，曾经轰轰烈烈、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会不会就这样面临跌落谷底，甚至完全消亡的命运呢？他们认为：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工业的崛起，儒学如能对西方文化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并开创出一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觉伦理，就必然会迎来继秦汉、

^① [日] 加藤周一：《21世纪与中国文化》，彭佳红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8页。

宋明之后的第三个发展复兴期。而1949年以后，栖身于港台地区的一代现代新儒家，也增强了学派意识，并形成了统一的思想纲领。1958年，台湾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及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在《宣言》呼吁：“中国文化必自重，才能重于世界，才能赢得世界的理解尊重”，并系统阐述了其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及未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乃至人类前途的方案。^①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其《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准确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构的基本不同，并着重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而许倬云先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则探讨了中国文化前途和命运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目前世界的各主要文化犹如百川汇海，未来将要合成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此时，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在这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中着力，加入我们中国文化的因素、补充其不足，匡正其错误，使这个文化因为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成分而得以稍近完美，这不仅有助于全世界后世的人类，对我们祖先也有交代。”^②而国学大师钱穆也曾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一文中，反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可大”“可久”特征。此文是钱穆先生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观点深深表现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

二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十年的“民族文化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义的文化研究被纳入历史学科中，狭义的文化探讨也被人为切割为很多小块，分别隶属于各门具体学科。^③当时，全国各地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几乎寥寥无几。高等院校中曾经开设过中国文化史课程的，也只有北大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此间，

① 陈少明：《文化保守主义宣言：评现代新儒家一个思想纲领》，《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第115页。

②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6页。

③ 季羨林曾在《群言》1987年7期撰文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受到大家拥护。过去不敢谈的问题，今天也敢谈了。解放前讨论文化问题，有过几次高潮。可是解放后，据我回忆，基本上没有过，文化讨论几乎成为一个禁地。”

中国文化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文革”前后则几乎陷入沉寂。“此后30余年中,全国学术视野中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出版物,书籍似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专门刊物也几等于零。”^①

20世纪80年代,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大陆学界逐步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梁漱溟、冯友兰、季羨林、周一良、张岱年、金克木、任继愈、钟敬文、李泽厚、张立文、俞吾金等学者都曾撰文参与。1982年12月,由上海《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顺利在沪召开。会议期间,各地学者对中外文化交流、文化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一致提出了中国文化研究紧迫性的问题。1984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全国首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与会学者就东西方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特点、差异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②其后,北京大学在1985年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并于1986年元月在北京举办了一期大型中国文化研究班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讲习班。讲习期间,应邀讲学的有知名文化学者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任继愈、李泽厚、庞朴、季羨林、周一良、张岱年等人和来自美国的杜维明、魏斐等新儒家代表,听众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等国的学者及在京的外国留学生代表,在当时产生了甚大影响。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6年初,全国各地的几十家主要报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北京大学报》《复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陆续开辟了专栏、出版了专刊,先后刊登了二百多篇中国文化研究文章,并围绕“文化有没有人文精神”(庞朴与黎鸣、黄克剑)、“中国有没有过文艺复兴”(萧箴父与包遵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鸣。1986年5月,第二届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会议在杭州召开,中顾委委员李锐出席会议,学者萧箴父、沈善洪、庞朴、王元化等人主持研讨。会议讨论了当时文化研究热潮的背景、文化的结构层次、要素功能分析,文化研究中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研究方法,“五四”时期文化争论的异同以及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等系列重要

① 郑晓江:《中国文化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和前景》,《社会科学》1986年4期,第11页。

② 刘京希:《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概述》,《文史哲》1986年4期,第11页。

问题。1989年1月,《中国文化》在京创刊,办刊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1991年5月,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隆重成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出席并发表讲话。

客观的讲,中国这次新兴起的“文化热”是由于对外开放浪潮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西方科技,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碰撞。在“文化讨论热”中,参与讨论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在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阵营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论调,其代表性学者梁漱溟就提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是因为西方在过去重视物质文明答案,而现在西方陷入物质文明的困境,就必然要向东方来寻求文明,儒学注定会在这一基础上得到新的复兴;与此对立,另一方阵营则主张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理由是西方文化趋向进取,中国文化趋向保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要再被继承了。^①持此论者,尤以1989年的《河殇》一书为典型代表。

此间,中国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与争鸣。其主要代表观点有:(1)甘阳、金观涛、黄克剑等的“根本的改造与彻底的重建传统”说。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性的封闭系统,不可能产生任何启蒙思想,也就不可能靠它的自我批判来进行内部更新。未来要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全力瓦解旧的文化系统,同时通过引进外来文化,才能“创造出过去的中国人民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②(2)于光远、黎澎、李泽厚等的“西体中用”说。李泽厚借用人类学本体论中“社会存在于本体”的概念,认为全世界走向的是现代物质文明道路,它首先是来自西方,包括我国社会的本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也同样来自西方。因此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说是“西体”。而“中用”讲的就是该怎样具体运用于中国实践,这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3)武汉大

① 王俊义:《关于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4期,第71页。

② 翟振业:《评80年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考》,《吴中学刊》1995年2期,第4页。

学萧蓬父、上海冯契、北京张广达等提出的“哲学启蒙”说。他们认为，给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带来特定的局限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难产”。封建意识的深厚积淀、宋明理学的传统惰力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复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阻力。当代中国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交锋中茫然失措。为此，“要尽快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发展，培育更为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①（4）郭齐勇的“新的综合”说。当时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郭齐勇撰文，激烈批评以上三说，并提出了“新的综合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光明前景既不是对传统连根拔除和全盘否定，也不是让传统在自我复归下的卷土重来，而是如何在中西文化初步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母体上以全方位角度、进行新综合，即对中西文化不分主从，更加广泛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②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社会形势变化及学术界研究的深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研究逐渐呈现出新的趋向。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有意识地摆脱简单的教条化研究模式，积极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开始注重社会史研究与思潮研究结合，社会思潮与哲学、文学及宗教学科的联系，并努力借鉴文化全球视野进行比较批判，从而更多的从交叉学科角度对近代国民文化心态变迁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社会史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与启发，并力图揭示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演变中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对此，高瑞泉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无疑是指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其无疑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阶层进而影响到生活世界与民众心理的思想运动……中国近代社会各类思潮，最后必将都归宿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历史战略大课题，因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意义影响”。^③这一时期，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呈现出了重视理论、偏重比

① 郭齐勇：《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述介》，《哲学动态》1986年9期，第4、5页。

② 刘京希：《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概述》，《文史哲》1986年4期，第14页。

③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较研究和框架分析倾向，在研究对象中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聚焦，体现出了研究日益深化的特征。当然，美中略显不足之处是，该时期文化研究对于社会实践的关注略显薄弱，对于中国社会实践影响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缺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的近20年“民族文化研究热”，实际上是继二三十年代“文化大辩论”后文化研究的一次恢复性回归。在这次“文化热”中，虽然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新成果，但总体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理论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还没有摆脱旧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例如，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有人提出了“西体中用”，并作了一些新的分析诊解。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在“西体西用”和“中体西用”之外开辟出的一种新思路，但其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体”“用”的二元性思维框架，其唯一结果只能使新理论、新思想重新被旧的理论、旧的思想所同化和淹没。^①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突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同时，这次文化讨论主要是以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主，讨论的“精英学术”气息过于浓重，以至于在文化讨论中广大工农群众，甚至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参与度都非常之低。

历史的分析，这一时期，学术界纯粹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渐趋退潮，而学风趋于踏实，研究选题更加具体和专业，文化变迁和比较研究成为热点。但这种重理论、轻操作化趋向，使得这次文化讨论并没有产生多么深远范围的实践影响，最终只是成为了那一代知识文化阶层的现代化浪漫憧憬。他们没有找到文化研究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变革及文化管理体制变革等一系列现实社会制度性变革相结合的突破点，从而使讨论走向学院派的理想化路线。同时，这场文化讨论所表现出的激进倾向和感性色彩，使之很难具有相应的理论深度和可供达成的学术共识。其结果是，这场文化讨论重新回归到了“五四”前后文化争论的状态，即还是在中学观和西学观之间以一种强烈感性化而非理性化的派系色彩在互相挹伐和攻击。当我们把今天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联系起来回顾时，仍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社会的

^① 方达：《“文化热”之我见》，《探索与争鸣》1987年5期，第19页。

每一历史转折,无论采取什么变革形式,最终都总是将深层次文化层面的问题凸现到醒目的重要位置。一个多世纪中喋喋不休的本末、体用、道器之争在当时依然争论不息,这足以使人感受到关于文化冲突图景理解中传统的沉重。当时的十余年“文化热”,一方面是长盛不衰的文化激进主义汹汹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承诺迟迟难以兑现,似乎举步维艰而且遥遥无期。可以说,这一强烈反差构成了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而难解的“结”(衣俊卿,1993),在这场文化热潮中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三 21 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文化嬗变与民族自信研究热潮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华民族大国崛起的进程,如何去除百年民族文化悲情、迎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共同课题。2001 年 10 月,李伯淳执笔,张岱年、季羨林等 76 位著名文化学者签名发表的《中华文化宣言》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中华文化的复兴,21 世纪必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面对文化全球化挑战,《宣言》从中华文化小圈子里走出,把中华民族放到人类大文化圈的视野中,把中华文化本位建设定位于人类文化之中,从而显示出新时代中国人对人类文化的责任和自信。在当代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化问题上,《甲申文化宣言》是“第一次把中国文化放在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全球文化平等位置上,所做出的更具建设性、更为成熟、更为自信表达的一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①此后,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研究继续前行,学科建设明显增强,人才培养更进一步,具体研究稳中求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次研究热潮,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化定位、文化未来方向、大国崛起文化等重大问题逐步展开研究。

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学界对百年中国文化嬗变与民族自信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主题:

(1) 近代中国文化及民族文化心态的嬗变。张岂之认为:辛亥革命揭开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序幕,“恢复中华”包含着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

^① 黄有东:《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对“五四”以来中国三次文化宣言的诠释》,《中华文化论坛》2005 年 3 期,第 123 页。